

柔性税收征管能降低企业不确定感知吗？

——基于纳税信用评级的准自然实验

杜雨晴¹,王金东¹,王梦凯²,杨婧³

(1.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42;2. 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872;

3. 内蒙古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要] 柔性税收征管是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从企业不确定感知视角,探讨柔性税收征管政策引致的溢出效应。以纳税信用评级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该政策的实施对企业不确定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柔性税收征管能够显著降低企业不确定感知。机制检验表明,柔性税收征管政策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进而降低企业不确定感知。企业层面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不确定感知的积极效果在非国有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明显;外部环境层面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不确定感知的积极效果在金融科技水平低、营商环境好和行业竞争程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柔性税收征管经济后果以及企业不确定感知的研究文献,也为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 柔性税收征管;纳税信用评级;不确定感知;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税收遵从;避税治理

[中图分类号] F8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25)03-0117-11

一、引言

在新发展格局下,世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强调“用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在此情景之下,作为经济社会的微观行为主体,企业的不确定感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话题。然而,在实践活动中,不少企业受限于资源约束、自身发展瓶颈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多重因素,常常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感知,并随之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有鉴于此,如何有效降低企业的不确定感知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不信不立,不诚不行”,诚信自古以来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经济领域均不断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纳税作为企业日常经营决策的重要一环,是影响企业不确定感知的关键因素。现有的税收征管方式大多为强制性征管活动,例如征税、税收检查等,用以规范企业纳税行为。为推动德法融合、德法兼治,促进纳税人诚信自律,国家税务总局 2014 年发布《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和《纳税信用评级指标和评价方式(试行)》,在考虑外部信息和历史信用信息之后自动生成企业的纳税信用评价,并向社会公开披露 A 级纳税人名单。可见,纳税信用评级政策是一种非强制征管活动,本文称之为“柔性税收征管”^[1-3]。纳税信用评级政策不同于强制性税收征管制度,具有更高的“普遍性”“扬善性”和“互动性”,可以有效发挥激励效果。在当前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进程中,不仅需要强制性税收征管制度的支持,也需要柔性税收征管的配合与激励,以保证改革能够顺利推进。因此,本文以纳税信用评级政策来刻画柔性税收征管。本文推测,纳税信用评级政策能有效地降低企业的不确定感知。

为何柔性税收征管制度能够降低企业的不确定感知? 本文认为,企业的不确定感知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

[收稿日期] 2024-06-11

[基金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JGSZ2023046);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规划课题(NGJGH2022501);中国人民大学 2024 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资助计划成果

[作者简介] 杜雨晴(1995—),女,山东枣庄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数字经济与公司治理研究;王金东(2002—),男,河南南阳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从事财务会计与审计研究;王梦凯(1998—),男,河南孟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公司财务与资本市场研究,通信作者,E-mail:mengkaiw@ruc.edu.cn;杨婧(1977—),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内蒙古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数字经济与政府审计研究。

是获取的资源有限,二是信息不对称和自身信息处理能力有限。柔性税收征管制度理论上可能通过“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来降低企业不确定性感知。一方面,柔性税收征管制度通过纳税服务、项目审批、财政资金使用以及筹集资金等领域的联合激励奖励手段,给予高纳税信用企业更多便利,同时提升企业声誉,进而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关键性资源支持^[4-7],即“资源效应”。另一方面,柔性税收征管制度通过对企业账簿信息和税务审计信息的稽查,缓解了企业管理层与信息使用者的信息不对称,约束了管理层选择性信息披露、财务舞弊以及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改善投资效率^[8-10],进而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信息环境,即“信息效应”。据此,本文认为,以纳税信用评级政策为代表的柔性税收征管能够降低企业的不确定感知。

基于此,本文选取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纳税信用评级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文本分析法从上市公司年报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提取“经济政策”与“不确定性”类词语,构造企业层面的不确定感知指标,进而考察柔性税收征管在降低企业不确定感知方面的作用。基准回归分析表明,柔性税收征管显著降低了企业的不确定感知。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主要结论依然成立。另外,本文揭示了柔性税收征管降低企业不确定感知的两个主要渠道:降低企业面临的资源约束和提高信息处理能力。为进一步检验柔性税收征管微观效果的差异性,本文从企业层面和外部环境层面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异质性分析。

相比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拓展了柔性税收征管制度的相关文献。现有柔性税收征管制度经济后果的文献集中于融资约束^[1]、纳税遵从^[2]、全要素生产率^[8]、债券市场反应^[9]以及企业创新^[11]等方面,本文考察了柔性税收征管制度对企业不确定感知的影响。第二,丰富了企业不确定感知的研究视角。现有关于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感知的文献较少,且多集中于宏观层面,例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不确定性等,但这类指标难以区分不同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感知,因此,有必要构建企业层面的不确定指标。本文检验了柔性税收征管制度对企业不确定感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补充了已有研究的空白。第三,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丰富政策制定者对柔性税收征管实施效果的认识,为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也有利于企业评估所面临的不确定环境,帮助其优化资源配置和信息环境,从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对于企业而言,不确定感知是企业关于制度政策内容等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是一种主观感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个体企业产生的冲击却是不同的。当企业从主观上感受到不确定性,又无法改变外部环境时,只能通过调整经营活动、投资策略以及主动学习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税收征管作为规范企业纳税行为的重要政策制度,必然对企业不确定感知产生影响。如前所述,影响企业不确定感知的两个主要因素是资源约束和信息处理能力有限^[12-13]。本文认为,具有柔性税收征管特点的纳税信用评级政策能够通过“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两个路径降低企业的不确定感知。

首先,纳税信用评级政策能够发挥“资源效应”。一方面,纳税信用评级作为一项“信用资产”,可以极大地提高企业的社会声誉,由此提高资源获取能力。纳税信用评价指标不仅涉及税务信息,还包含了纳税企业留存在环保、工商、银行以及质检等部门的历史信用记录,因此企业当年各个方面的较高信用能够凭借纳税信用评级结果为A表现出来^[1-2]。此外,企业在评价年度之前的优良或不良信用记录都会对本年度纳税信用等级的评定产生影响,如果上一年度的纳税信用评级为D级,那么企业的纳税信用评级在本年度将无法赢得A^①。由此可见,纳税信用评级是经过多个政府部门持续性地对企业诚实守信经营品质权威鉴证之后的结果,可以向股东、供应商、消费者、政府、社区等彰显企业的良好信用记录、守法纳税以及负责任的积极形象,可以极大提升企业的社会声誉。进一步地,当企业声誉信号持续释放并被市场不断关注时,可以引导、整合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同时促使企业能够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基于声誉的信任关系^[10-11],为其合作关系的长远发展提供隐性担保,实现耦合共轭,助力企业提升向外界获取资源支持的能力。另一方面,获得纳税信用评级A级的企业将有机会享受更多税收优惠政策。为了激励守信企业并惩罚失信纳税行为,国家税务总局与其他相关部门共同采取行动,对纳税信用评级达到A级的企业采取联合激励措施^[3]。例如,2015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原中国银行

①在《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推广“银税互动”合作,推动参与“银税互动”合作的金融机构充分利用企业纳税信用评级结果,加大对信用评级高的企业信贷支持力度,实现“以诚相贷”。纳税信用评级高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资金支持和银行贷款^[14-16]。与此同时,纳税信用评级达到 A 级的企业可以优先被选为税收优惠政策试点,享受快速办理出口退税和优先使用绿色办税通道的待遇等。因此,纳税信用评级政策能够便利纳税信用评级 A 级企业经营,有效提高经营效率。外部政策激励有助于企业维持稳健的财务状况,使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资源边界约束,将更多资源投入创新驱动和实体主业发展,而不必将过多的精力置于资金管理领域^[17-19],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财务困境风险。可见,企业通过提高对资源的获取能力,有效地降低资源约束压力,提高了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和可预期性,从而降低了不确定感知。

其次,纳税信用评级政策能够发挥“信息效应”。第一,纳税信用评级政策可以促使企业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根据《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如果企业未按照会计制度规定设立账簿且准确核算,则不能被认定为纳税信用 A 级,并对于企业在关联方交易业务、提供虚假涉税材料等方面作出明确、严厉的扣分规定。在此情境下,企业想要获得纳税信用评级政策带来的各项政策福利,就应当严格遵守会计制度规则的相应规定,向外界披露高质量的财务报告。因此,当企业获得纳税信用 A 级评级时,显示了其对相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的严格遵守,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从而提升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进一步地,如果企业存在涉及“0601. 涉税犯罪”和“0602. 涉税违法被行政处罚”这两个指标所涵盖的情况,将直接评定企业的纳税信用评级为 D 级。因此,避税程度较低的企业在更大的概率上会被评为纳税信用 A 级,而较低避税程度的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企业信息透明度^[20]。第二,纳税信用评级可以降低分析师预测偏差。一方面,较高的纳税信用评级具有丰富的信息含量,会形成信息溢出效应,从而使企业与外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为分析师预测提供更多的信息数量^[21]。另一方面,较高的纳税信用评级有助于凝聚诚实守信的企业文化,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在诚信文化的指引和约束下,企业对自身行为和道德标准有更严格的要求,提供及时准确的盈余信息,有效地降低企业与分析师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为分析师预测提供更高质量的信息,降低分析师预测难度^[22-23]。第三,纳税信用评级可以提高投资效率。在实践中,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资本市场摩擦导致企业投资可能偏离最优水平。如前所述,纳税信用评级在提高信息透明度之后,股东可以获得对企业真实经营状况的了解,降低代理成本,通过建立合理的投资绩效评价机制监督管理层的投资行为。同时,纳税信用评级政策可以吸引更多媒体、分析师和投资者的关注,发挥良好的监督作用,进一步改善投资决策的信息环境。在更透明公开的信息环境中,高管为构筑商业帝国的过度投资行为和为避免担责的投资不足行为均得到有效抑制^[24-26]。可见,企业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信息处理能力,一方面加强了与外界的信息互动,另一方面提升了对外投资效率,提高了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和可预期性,从而降低了不确定感知。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柔性税收征管影响企业不确定感知的可能渠道如图 1 所示。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_1 、 H_2 和 H_3 。

H_1 : 柔性税收征管能够降低企业不确定感知。

H_2 : 柔性税收征管能够通过“资源效应”,即提高信贷能力与降低财务困境风险,进而降低企业不确定感知。

H_3 : 柔性税收征管能够通过“信息效应”,即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降低分析师预测偏差和改善投资效率,进而降低企业不确定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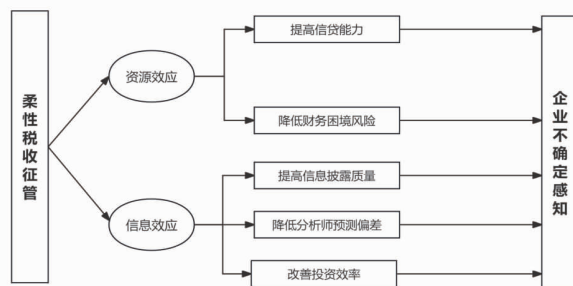


图 1 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不确定感知的影响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0—2021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参照孙雪娇等^[1]的研究,将 2015 年纳税信用评级政策作为一项外生冲击,并对原始样本数据进行以下处理:(1)剔除 ST、*ST 上市公司;(2)剔除相关财务指标严重缺失的上市公司;(3)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4)为减少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 1% 分位上的缩尾处理。经过对数据的清洗筛选后,本文共得到 27897 个观测值。本文纳税信用评级数据通

过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的纳税信用评级栏目企业名单中收集而得,其余数据主要来源于 CSMAR 和 WIND 数据库。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不确定感知(*Fepu*)。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人们使用的词汇和频率是其认知和偏好的反映。因此,上市公司发布的年报中的词汇特征是反映企业认知的有效方式之一。参考聂辉华等^[27]和方明月等^[13]的研究,本文对上市公司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进行文本数据挖掘,通过相关词汇频率统计的方法,衡量企业不确定感知。首先,利用 Python 对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文本进行分词并统计词频;其次,人工阅读政府发布的政策性报告、文件等,提取“经济政策”与“不确定性”类词语,构建相关词汇列表。当句子中同时存在两类词汇时,将其判定为不确定感知的相关表述。最后,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句子中包含的不确定性词语数量除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总词汇数计算出企业不确定感知指标。具体公式如下:

$Fepu = \text{不确定性句子中包含的不确定性词语} / \text{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总词汇数}$ 。*Fepu* 的值越大,代表企业感知到的不确定感知越高。为避免回归系数过小,本文对企业不确定感知(*Fepu*)做百分化处理。

2. 解释变量

(1) 纳税信用评级结果虚拟变量(*Treat*)。本文采用 Python 爬虫上市公司社会信用代码、税务登记号和名称等信息,并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输入“纳税人名称”和“纳税人识别号”两个关键词对纳税信用评级为 A 级的纳税人名单进行检索,识别上市公司纳税信用等级是否为 A 级。参考孙雪娇等^[1]和闫慧慧^[28]的研究,如果上市公司纳税信用评级为 A,则 *Treat* 取值为 1,否则为 0。

(2) 政策时间虚拟变量(*Post*)。纳税信用评级政策于 2014 年 10 月 1 日开始实施,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5 年开始对外发布纳税信用评级为 A 的企业名单,本文将披露评级后的年份 *Post* 取值为 1,否则为 0。

3. 机制变量

(1) 银行信贷规模(*Loans*)。参考方明月等^[13]的研究,本文采用无须提供担保即可从银行获取的银行信用贷款规模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衡量银行信用贷款规模。

(2) 企业财务困境风险(*Oscore*)。参考 Ohlson^[29]的研究,本文采用 *Oscore* 指数衡量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具体计算公式为:

$$OScore = -1.32 - 0.407Size + 6.03Lev - 1.43Wcta + 0.0575Clca - 2.37Roa - 1.83Futl + 0.285Intwo - 1.720enge - 0.521Chin$$

其中,*Wcta* 为营运资金与总资产比值,*Clca* 为流动负债与流动资产比值,*Futl* 为经营性净现金流与总负债比值,*Intwo* 为过去两年是否亏损虚拟变量,*Oenge* 为是否资不抵债虚拟变量,*Chin* 为净利润增长率,其余见控制变量。*Oscore* 值越大,代表企业风险系数越高。

(3) 企业信息披露质量(*Trans*)。参考辛清泉等^[30]的研究,本文采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考核结果进行衡量。具体而言,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从高到低划分为 A、B、C、D 四个等级,并分别赋值为 4、3、2、1,分值越大代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4) 分析师预测准确度(*Error*)。参考褚剑等^[31]的研究,本文采用分析师年度最后一次盈余预测均值与实际盈余之间差额的绝对值,除以企业每股市价衡量分析师预测准确度。

(5) 非效率投资(*Abinvest*)。参考 Richardson^[32]、李青原和罗婉^[33]的做法,本文建立如下投资模型,并根据模型进行回归,以残差的绝对值衡量企业投资效率。

$$Invest_t = \alpha_0 + \alpha_1 Growth_{t-1} + \alpha_2 Lev_{t-1} + \alpha_3 Cash_{t-1} + \alpha_4 Age_{t-1} + \alpha_5 Size_{t-1} + \alpha_6 Ret_{t-1} + \alpha_7 Invest_{t-1} + \delta_h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其中,*Invest* 为企业效率投资,*Age* 为上市年限,*Cash* 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Ret* 为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回归残差的绝对值越大,代表企业投资效率越低。

4. 控制变量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参考孙雪娇等^[1]的做法,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成长性(*Growth*)、固定资产占比(*Fixed*)、产权性质(*Soe*)、两职合一(*Dual*)、独立董事占比(*Indep*)、行业整体风险(*Riskind*)、企业所在城市 *Gdp* 增长率(*Gdp*)。同时,本文控制了年份、行业固定效

应。具体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

(三)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1),用以分析
纳税信用评级政策对企业不确定感知的
影响:

$$Fepu_{i,t} = \alpha_0 + \alpha_1 Treat \times Post_{i,t} + \alpha_2 Controls_{i,t} + \delta_h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不确定感知
(*Fepu*),核心解释变量为交乘项(*Treat* ×
Post), ε 为随机误差项,其余为前文所述控
制变量。为避免时间和行业层面不可观测
因素的影响,本文控制了年份(δ_t)和行业
(δ_h)固定效应。若估计系数 α_1 显著为负,
则说明纳税信用评级政策能够显著降低企
业不确定感知,假设 H1 得以验证。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可以看
出,经缩尾处理后,主要变量不存在极端异
常值。上市公司不确定感知的均值为 0.088,
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0.446,表明不同公司不确定感
知存在较大差异。纳税信用评级结果(*Treat*)均值为
0.450,表明纳税信用评级为 A 的上市公司约占全部
上市公司的 45%。其余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与现
有研究大致一致,数据均在合理区间之内。

(二)基准回归分析

表 3 报告了纳税信用评级政策对企业不确定感知的
回归结果。为增强回归的稳健性,本文在控制时间
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的基础上,逐步增加控制变
量。列(1)为仅加入交乘项、行业 and 年度虚拟变量时,
纳税信用评级政策对企业不确定感知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Treat* × *Post* 的回归系数为 -0.004,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在不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
下,纳税信用评级政策对企业不确定感知产生显著的
负向作用。列(2)和列(3)为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的
回归结果。结果显示,*Treat* × *Post* 的回归系数均为
-0.003,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在柔性税收征
管显著降低了企业不确定感知,本文假设 H1a 得到支持。

(三)影响机制分析

理论分析表明,柔性税收征管能够通过促进企业资源获取、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提高信息处理能力以发挥柔
性税收征管的激励效应,本部分将分别对上述两种机制进行验证。

1. 资源效应

柔性税收征管能够提高银行信贷能力和降低财务困境风险,从而减少企业不确定感知。基于此,本文分别
选取银行信用贷款规模和企业财务困境风险构建企业资源获取能力差异的情境来识别检验这一作用机制。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被解释变量	<i>Fepu</i>	不确定感知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句子中包含的不确定性 词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总词汇数 × 100%
解释变量	<i>Treat</i>	纳税信用评级结果	若企业纳税信用被税务机关评为 A 级,则赋 值为 1,否则为 0
	<i>Post</i>	纳税信用评级政策实施	纳税信用评级政策实施后年份取值为 1,否 则为 0
机制变量	<i>Loans</i>	银行信贷规模	银行信用贷款规模/总资产
	<i>Oscore</i>	企业财务困境风险	<i>OScore</i> 指数
	<i>Trans</i>	企业信息披露质量	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工作考核等级
	<i>Ferror</i>	分析师预测准确度	分析师年度最后一次盈余预测均值与实际 盈余之间差额的绝对值/企业每股市价
控制变量	<i>Abinvest</i>	非效率投资	投资效率回归残差的绝对值
	<i>Size</i>	企业规模	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i>Lev</i>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总资产
	<i>Roa</i>	总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报酬率,净利润/资产总额
	<i>Growth</i>	成长性	营业收入增长率
	<i>Fixed</i>	固定资产占比	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
	<i>Soe</i>	产权性质	虚拟变量,国有企业取 1,否则取 0
	<i>Dual</i>	两职合一	虚拟变量,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兼任取 1,否则取 0
	<i>Indep</i>	独立董事比例	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比例
	<i>Riskind</i>	行业整体风险	当年企业所在行业总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
	<i>Gdp</i>	Gdp 增长率	企业所在地区 Gdp 增长率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mean	sd	min	median	max
<i>Fepu</i>	27897	0.088	0.095	0.000	0.058	0.446
<i>Treat</i>	27897	0.450	0.496	0.000	0.000	1.000
<i>Post</i>	27897	0.617	0.498	0.000	1.000	1.000
<i>Loans</i>	14915	0.042	0.041	0.000	0.029	0.213
<i>Oscore</i>	27036	-8.256	2.367	-16.076	-8.085	-1.137
<i>Trans</i>	27079	3.042	0.605	2.000	3.000	4.000
<i>Ferror</i>	24306	2.458	5.474	0.006	0.715	10.875
<i>Abinvest</i>	27414	0.074	0.083	0.000	0.049	0.506
<i>Size</i>	27897	22.202	1.391	19.425	21.983	27.061
<i>LEV</i>	27897	0.430	0.215	0.053	0.421	0.978
<i>Roa</i>	27897	0.043	0.064	-0.226	0.039	0.222
<i>Fixed</i>	27897	0.211	0.163	0.002	0.177	0.711
<i>Growth</i>	27897	0.175	0.420	-0.582	0.106	2.585
<i>Soe</i>	27897	0.401	0.490	0.000	0.000	1.000
<i>Dual</i>	27897	0.264	0.441	0.000	0.000	1.000
<i>Indep</i>	27897	0.374	0.054	0.000	0.375	0.571
<i>Riskind</i>	27897	0.049	0.023	0.011	0.042	0.107
<i>Gdp</i>	27897	7.730	3.012	0.300	7.700	15.900

(1)银行信用贷款规模。本文认为,信用贷款是指企业无须提供担保即可从银行获取的贷款,比一般贷款更能够体现银行对企业的信用。具体地,本文借鉴方明月等^[13]的研究,采用银行信用贷款规模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衡量银行信用贷款规模。柔性税收征管对银行信贷规模的机制检验结果如表4第(1)列、第(2)列所示。结果显示, $Treat \times Post$ 的系数为0.002,且通过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柔性税收征管能够显著提升银行信用贷款规模,列(2)柔性税收征管对银行信贷规模的回归系数为-1.727,且通过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柔性税收征管可以通过提升银行信用贷款规模,降低企业不确定感知。

(2)企业财务困境风险。本文采用OScore指数衡量企业财务困境风险。OScore值越大,代表企业风险系数越高。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的机制检验结果如表4第(3)列、第(4)列所示。结果显示, $Treat \times Post$ 的系数为-0.002,且通过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柔性税收征管能够显著提升银行信用贷款规模,列(4)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财务困境风险的回归系数为0.058,且通过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柔性税收征管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财务困境,从而降低企业不确定感知。综上可知,假设H2得以验证。

2. 信息效应

本文将柔性税收征管的信息效应划分为企业信息透明度和管理层信息处理能力两个角度,分别进行检验。

第一,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作用。柔性税收征管能够推动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从而带来企业不确定感知的降低。基于此,本文分别选取信息披露质量和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构建信息透明度差异的情景,以识别检验这一作用机制。

(1)企业信息披露质量(Trans)。本文参考辛清泉等^[30]研究,采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考核结果进行衡量。柔性税收征管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机制检验结果如表5第(1)列、第(2)列所示。结果显示, $Treat \times Post$ 的系数为0.054,且通过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柔性税收征管能够显著提升信息披露质量,第(2)列柔性税收征管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003,且通过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柔性税收征管可以通过提升银行信用贷款规模,降低企业不确定感知。

(2)分析师预测准确度(Ferror)。分析师是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重要的信息中介,其盈余预测能够反映企业信息透明度。参考褚剑等^[31]的研究,本文采用分析师年度最后一次盈余预测均值与实际盈余之间差额的绝对值,除以企业每股市价衡量分析师预测准确度。Ferror值越低,代表分析师预测准确度越高。柔性税收征管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机制检验结果如表5的第(3)列、第(4)列所示。结果显示, $Treat \times Post$ 的系数为-0.428,且通过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柔性税收征管能够显著提升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第(4)列柔性税收征管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回归系数为0.029,且通过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柔性税收征管可以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不确定感知。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i>Fepu</i>	(2) <i>Fepu</i>	(3) <i>Fepu</i>
<i>Treat × Post</i>	-0.004 ** (-2.46)	-0.003 ** (-2.33)	-0.003 ** (-2.19)
<i>Size</i>		0.005 *** (4.35)	0.004 *** (3.47)
<i>Lev</i>		0.017 *** (3.07)	0.013 ** (2.36)
<i>Roa</i>		0.003 (1.64)	-0.005 (-0.44)
<i>Fixed</i>		-0.008 (-1.21)	-0.010 (-1.39)
<i>Growth</i>		-0.002 (-1.30)	-0.001 (-1.03)
<i>Soe</i>			0.004 (1.42)
<i>Dual</i>			0.001 (0.50)
<i>Indep</i>			0.000 (0.13)
<i>Riskind</i>			0.007 (1.25)
<i>Gdp</i>			-0.011 ** (-2.34)
<i>_Cons</i>	0.033 *** (3.44)	-0.061 *** (-2.66)	-0.066 ** (-2.46)
<i>Year</i>	YES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YES
<i>N</i>	27897	27897	27897
<i>R-squared</i>	0.090	0.103	0.104

注:***、**、*分别代表在0.01、0.05、0.1的显著水平,括号内为*t*值,下同。

表4 作用机制检验:资源效应

变量	(1) <i>loans</i>	(2) <i>Fepu</i>	(3) <i>Oscore</i>	(4) <i>Fepu</i>
<i>Treat × Post</i>	0.002 *** (2.64)	-0.003 * (-1.79)	-0.002 *** (-3.22)	-0.003 ** (-1.98)
<i>loan</i>		-1.727 *** (-3.60)		
<i>Oscore</i>				0.058 * (1.73)
<i>_Cons</i>	0.126 *** (8.25)	-0.009 (-0.29)	0.052 *** (7.76)	-0.040 (-1.54)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YES	YES
<i>N</i>	14915	14915	27036	27036
<i>R-squared</i>	0.130	0.185	0.064	0.119

第二,本文检验柔性税收征管对管理层的信息处理能力的提升作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管理层的信息处理能力主要表现为能够洞察经济环境变化,整合内外部资源,以把握最佳投资机会^[33-34]。因此,本文选取企业非效率投资构建管理层信息处理能力差异的情景,以识别检验这一作用机制。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机制检验结果如表 5 第(5)列、第(6)列所示。结果显示,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回归系数为 -0.008,且通过了 1% 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柔性税收征管能够显著减少企业非效率投资,

第(6)列柔性税收征管对非效率投资的回归系数为 0.012,且通过 10% 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柔性税收征管可以通过提升管理层信息处理能力,从而带来企业不确定感知的降低。综上可知,假设 H3 得以验证。

(四)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政策评估研究的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如果企业不确定感知受其他未观测到的特征的影响,那么在纳税信用评级政策实施前后的企业不确定感知应不会在时间上表现出差异。同时,如果柔性税收征管的实施确实产生了政策效应,则企业不确定感知在政策实施后应显著为负。本文在 95% 的置信区间内生成估计系数,结果如图 2 所示。结果表明,在纳税信用评级政策实施之前,实验组与对照组企业之间的不确定感知时间趋势没有显著差异。然而,在纳税信用评级政策实施之后,实验组企业不确定感知显著降低。

2. 安慰剂检验

如果企业不确定感知的降低确由柔性税收征管导致,而不是任一等级都存在的现象,那么在样本企业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企业,将其纳税信用等级设定为 A,并进行基准回归实验,应不会出现显著结果。本文借鉴孙雪娇等^[1]和闫慧慧^[28]的做法,在样本中随机抽取部分企业,将其纳税信用评级设定为 A 级,并对模型(1)进行 500 次重复回归。估计系数的核密度分布及其 P 值如图 3 所示。 $Treat \times Post$ 的回归系数集中分布在 0 附近,小于模型(1)估计的真实值,表明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不确定感知的影响稳健。

3. 倾向得分匹配法

为保证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各特征变量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提高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检验。本文将处理组和对照组分别设置为纳税信用评级为 A 的企业和纳税信用评级为非 A 的企业,以基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采用最临近、有放回 1: 1 匹配的形式进行匹配,并采用基准回归模型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检验。表 6 第(1)列展示了对匹配后样本重新回归的结果,结果显示, $Treat \times Post$ 的回归系数为

表 5 作用机制检验:信息效应

变量	(1) <i>Trans</i>	(2) <i>Fepu</i>	(3) <i>Ferror</i>	(4) <i>Fepu</i>	(5) <i>Abinvest</i>	(6) <i>Fepu</i>
<i>Treat</i> × <i>Post</i>	0.054 *** (6.15)	-0.001 (-0.79)	-0.428 *** (-4.49)	-0.003 ** (-2.07)	-0.008 *** (-5.02)	-0.002 * (-1.65)
<i>Trans</i>		-0.003 *** (-2.77)				
<i>Ferror</i>				0.029 * (1.72)		
<i>Abinvest</i>						0.012 * (1.79)
<i>_Cons</i>	0.301 ** (2.13)	-0.048 * (-1.84)	6.967 *** (6.07)	-0.055 ** (-2.22)	0.081 *** (4.69)	-0.025 (-0.97)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27079	27079	24306	24306	27414	27414
<i>R-squared</i>	0.106	0.126	0.218	0.117	0.136	0.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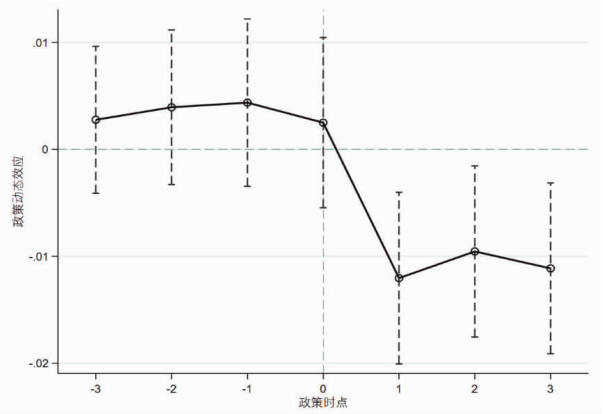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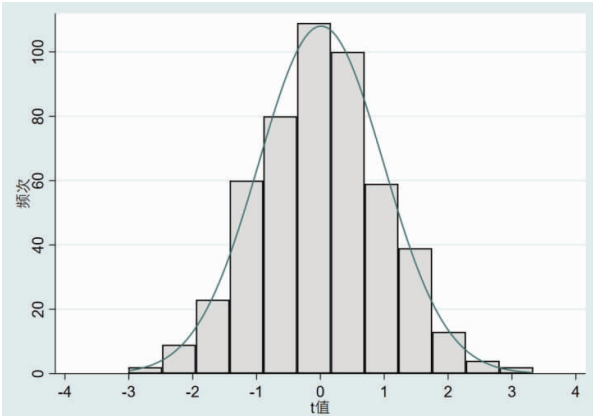


图 3 安慰剂检验图

-0.00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4.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聂辉华等^[27]的方法,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表述相关句子占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全部句子中的数量衡量企业不确定感知。当句子中同时存在“经济政策词语”与“不确定性词语”列表中词汇时,该句被判定为不确定感知的相关表述句子。本文以计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关句子占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总句子数量的比例,衡量企业不确定感知指标(*Fepu2*)。表6第(2)列展示了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替换被解释变量后,*Treat × Pos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与上文研究保持一致。

5. 加入省份控制效应

由于各省份之间政策、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不同,导致不同省份之间企业不确定感知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在控制年份、行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省份控制变量,并对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以消除省份之间政策、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6第(3)列所示,*Treat × Pos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与上文研究保持一致。

6. 排除重大卫生事件影响

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宏观经济环境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可能影响企业不确定感知。为剔除新冠疫情影响,本文采用2010—2019年的数据对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第(4)列所示。结果显示,更换时间范围后,*Treat × Pos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与上文研究保持一致。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Fepu	(2) Fepu2	(3) Fepu	(4) Fepu
<i>Treat × Post</i>	-0.006 *** (-3.03)	-0.062 ** (-2.34)	-0.005 *** (-3.92)	-0.004 ** (-2.35)
<i>_Cons</i>	-0.091 *** (-4.29)	-0.490 (-1.08)	-0.039 (-1.42)	-0.056 * (-1.92)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YES	YES
<i>Province</i>	NO	NO	YES	NO
N	14272	27897	27897	23899
R-squared	0.117	0.102	0.142	0.136

五、异质性分析

企业间差异有可能影响纳税信用评级的作用效果,导致不同企业间不确定感知存在差异。因此,本文按照企业性质以及企业所处外部环境对上市公司进行分组,考察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不确定感知的异质性影响。

(一) 企业性质

1. 产权性质

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资金约束、治理机制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导致柔性税收征管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不确定感知的影响效果可能会有所不同。从融资角度来看,非国有企业融资成本相比国有企业普遍更高,并且在面临财务困境时,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资金援助,因此,国有企业在面临风险时存在的资金问题并不严重^[35-36]。柔性税收征管通过“资源效应”的发挥,能够帮助非国有企业缓解更大的资金约束问题,为其带来更多的资源支持,更显著地降低非国有企业的不确定感知。

同时,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导致存在“内部代理人”“预算软约束”等问题,并且国家作为大股东可能更多出于社会效益而非经济利益考虑,迫使战略决策偏离利润最大化^[37]。因此,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难以通过柔性税收征管产生的“信息效应”降低不确定感知。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预期柔性税收征管对于非国有企业不确定感知的降低作用更显著。

基于此,本文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分组检验,检验结果如表7第(1)列、第(2)列所示。从回归结果来看,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不确定感知的回归系数为显著为负,而国有企业样本不显著,这说明柔性税收征管显著降低了非国有企业不确定感知,而对于国有企业不确定感知的降低无明显效果。

2. 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是企业在金融市场中获取资源的重要影响因素。相比大规模企业,中小规模企业扩张的积极性更

表7 不同企业性质异质性影响

变量	(1) 国有企业	(2) 非国有企业	(3) 大规模企业	(4) 中小规模企业
<i>Treat × Post</i>	-0.003 (-1.41)	-0.003 * (-1.74)	-0.003 (-1.61)	-0.004 * (-1.94)
<i>_Cons</i>	-0.065 (-1.62)	-0.038 (-0.97)	0.031 (0.66)	-0.139 *** (-3.06)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YES	YES
N	11189	16675	13920	13944
R-squared	0.100	0.120	0.086	0.164

高,但获取银行信贷的困难程度更高,面临的财务风险更大。另外,大规模企业普遍比中小型企业拥有更高的信息透明度和更强信息处理能力^[38]。因此,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柔性税收征管能够通过帮助其提升资源获取能力、帮助其降低与外界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信息处理能力,从而显著降低其不确定感知。由此推断,相比大规模企业而言,柔性税收征管对于中小规模企业不确定感知的降低作用更加显著。

基于此,本文按照规模的中位数将企业分为大规模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并进行分组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7 第(3)列和第(4)列所示。中小规模企业样本中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不确定感知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而大规模企业样本不显著。由此说明,相比大规模企业,柔性税收征管对降低中小规模企业不确定感知的效果更加显著。

(二) 外部环境

1. 金融科技水平

金融科技通过广泛化的服务范围、大众化的客户群体以及数字化的经营模式,产生独特的信息优势,为投融资主体建立信息沟通的桥梁,同时为信息供给方和需求方提供信息池,缓解信息不对称,提升企业信息处理能力。由此可见,金融科技水平高的地区,柔性税收征管更易与金融科技发挥协同作用,形成政策“组合拳”,更有利于降低企业不确定感知^[39-40]。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预期当企业所处环境金融科技水平较高时,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不确定感知的降低作用更加显著。

本文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发布的各省数字金融普惠指数衡量各省份金融科技水平,并按照金融科技水平的中位数分组检验。表 8 第(1)列、第(2)列结果显示,金融科技水平高组 $Treat \times Post$ 的估计系数为 -0.004 ,并通过 5%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而金融科技水平低组 $Treat \times Post$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表明相比所处环境金融科技水平低的企业而言,所处环境金融科技水平高的企业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不确定感知的降低效果更加显著。

2. 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区域制度性因素的重要体现,包含市场、政务、法律政策、人文环境等方面。良好的市场环境和人文环境带来更高的社会信用,为资源获取提供有力支持,也能更好地促进企业与外部各方的信息交流,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和信息处理能力^[41-42]。同时,较好的法律政策环境加强了企业的外部监管力量,为企业的资源获取和信息传递提供坚实保障。由此可见,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柔性税收征管发挥“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的基石,能够推动纳税信用评级激励效应的发挥,对降低企业不确定感知具有更加显著的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预期当企业所处营商环境较好时,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不确定感知的降低作用更加显著。

本文参考张三保等^[42]的研究,将市场、政务、法律政策和人文环境作为一级指标,构建中国省份营商环境指标评价体系,按照上市公司所处省份营商环境分值的中位数分组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8 第(3)列、第(4)列所示。结果显示,营商环境较好组 $Treat \times Post$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而处于营商环境较差组 $Treat \times Post$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表明相比处于

表 8 企业所处环境异质性影响

变量	(1) 金融科技水平高	(2) 金融科技水平低	(3) 营商环境好	(4) 营商环境差	(5) 行业竞争程度低	(6) 行业竞争程度高
$Treat \times Post$	-0.004 ** (- 2.01)	-0.003 (- 1.46)	-0.003 ** (- 2.24)	-0.002 (- 1.10)	-0.002 (- 1.27)	-0.004 * (- 1.79)
$_Cons$	-0.072 ** (- 2.30)	-0.013 (- 0.39)	-0.059 ** (- 2.19)	0.302 (0.79)	-0.045 (- 1.35)	-0.073 ** (- 2.0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2893	14971	14234	13630	14850	13014
R-squared	0.131	0.141	0.108	0.058	0.132	0.078

较差营商环境的企业而言,处于较好营商环境的企业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不确定感知的降低作用更加明显。

3. 行业竞争程度

行业竞争程度体现了市场的竞争和垄断程度。当行业竞争程度高时,意味着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程度高,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往往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而柔性税收征管通过帮助企业降低组织成本、提升资源获取能力,从而降低企业财务困境,发挥“资源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预期当企业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较高时,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不确定感知的降低作用更加显著。

本文根据赫芬达尔指数衡量行业竞争程度,并按照行业竞争程度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行业竞争程度低与行业竞争程度高两组分别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8 第(5)列、第(6)列。结果显示,行业竞争程度高组 $Treat \times Post$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而行业竞争程度低组 $Treat \times Post$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表明相比所处行业竞争程度

低的企业而言,柔性税收征管对所处行业竞争程度高的企业不确定感知的降低作用更加显著。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纳税信用评级作为柔性税收征管制度,其在提高纳税遵从度的同时,能否发挥“激励效应”,对降低企业不确定感知产生溢出效果?本文以2010—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A股非金融类样本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柔性税收征管能够降低企业不确定感知;(2)机制检验表明,柔性税收征管通过提升资源获取能力、提高信息透明度和信息处理能力,从而降低企业不确定感知;(3)当企业为非国有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时,柔性税收征管对降低企业不确定感知的效果更加显著,并且当企业处于金融科技水平高、营商环境好以及行业竞争程度高的环境时,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不确定感知的降低效果更加显著。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结论具有如下启示:

第一,为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提供新的方向。与以往具有较强“约束效应”的强制性税收征管政策相比,柔性税收征管政策不仅能够通过守信激励机制与强制性税收征管的失信惩戒机制相互协同,促进纳税人纳税遵从度的提高,还能够在声誉、融资、治理方面发挥其独特的“激励效应”。然而,当前我国依然是强制性税收征管方式占据主流。因此,未来可考虑扩大柔性税收征管的适用范围,不断创新柔性征管的具体方式,如协商型监管、自我监管、升级优化纳税信用复评机制等多种方式,鼓励纳税人自愿披露纳税信息,推进税收征管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使企业更好地应对不确定环境。

第二,为完善柔性税收征管提供新的启示。要想充分发挥柔性税收征管对企业不确定感知的作用效果,一是要提升评级结果质量,合理设置评选涉及的各项评级指标类别及占比,大力提高社会公众的监督力度,以提高纳税信用评级的准确度。二是需完善柔性税收征管的激励措施,打好税收激励“组合拳”。一方面,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及时、完整地向社会公众披露纳税信用评级过程和结果,鼓励纳税企业自愿在报告中披露纳税信用评级状况,提高社会各界的参与力度。另一方面,需加强各监管机构的信息交流,综合纳税企业在税务、工商、银行等各部门的情况,对纳税企业实施多样性的激励措施,尤其是针对企业融资困难等问题,深化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合作,加大对高评级企业在融资方面的实质性激励。

第三,企业应当密切关注税收政策的变化,主动与税收征管部门互动,为提振信心打开新的思路。对于企业而言,纳税信用评级是企业社会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向社会公众传播企业良好的声誉,帮助企业获取更多资源,还能吸引更多媒体、分析师、社会公众的关注,与税务机关一同发挥对企业的监督作用。企业应当充分利用纳税信用评级的平台优势,以此构建的纳税声誉实现有效的自我激励,提高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从而降低企业不确定感知。

参考文献:

- [1] 孙雪娇,翟淑萍,于苏. 柔性税收征管能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自纳税信用评级披露自然实验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2019(3):81-99.
- [2] 李建军,范源源. 光环之下:纳税声誉能否提升企业税收遵从[J]. 当代财经,2020(8):28-40.
- [3] 曾亚敏,张俊生. 税收征管能够发挥公司治理功用吗[J]. 管理世界,2009(3):143-151.
- [4] 张翼飞,张双龙,刘奥. 税收征管柔性化与企业ESG表现[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12):57-73.
- [5] 周泽将,刘瑾,雷玲. 纳税信用评级的避税治理效应研究——基于设立低税率异地子公司的视角[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25(1):21-37.
- [6] 王佳,李文. 柔性税收征管、声誉机制与企业税负:理论与实证[J]. 现代经济探讨,2022(10):64-75.
- [7] 陶春华,刘亦舒,林晚发. 纳税信用评价与审计定价[J]. 审计研究,2021(6):90-101.
- [8] 冀云阳,高跃. 税收治理现代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企业纳税信用评级准自然实验的研究[J]. 财经研究,2020(12):49-63.
- [9] 林晚发,顾乾坤. 纳税信用评价的债券市场反应[J]. 经济管理,2021(10):119-137.
- [10] 李柯润,陈家和,吴一平,等. 纳税信用的供应链传递效应研究[J]. 财贸经济,2024(3):41-58.
- [11] 叶永卫,曾林,李佳轩.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与企业创新——“赏善”比“罚恶”更有效? [J]. 南方经济,2021(5):52-68.
- [12] Bloom N. Fluctuations in uncertainty[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4,28(2):153-176.
- [13] 方明月,聂辉华,阮睿,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不确定感知[J]. 金融研究,2023(2):21-39.
- [14] 杨玉萍. 纳税信用管理与财政补贴效率[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22(4):96-104.
- [15] 张勇. 企业纳税与银行信贷资源配置:诚信纳税能为企业带来“真金白银”吗? [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0(7):54-70.
- [16] 刘京焕,朱泓锟,谢立成. 纳税信用评级与中小企业债务融资[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5):44-55+83.

- [17] 许罡,朱卫东. 金融化方式、市场竞争与研发投入挤占——来自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科学学研究,2017(5):709-719+728.
- [18] 牛彪,于翔,丁亚楠,等. 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2024(7):982-991.
- [19] Desai M A, Dyck A, Zingales L. Theft and Tax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7,84(3):591-623.
- [20] 王跃堂,王亮亮,贡彩萍. 所得税改革、盈余管理及其经济后果[J]. 经济研究,2009(3):86-98.
- [21] 梁上坤,李泳彤. 纳税规范能改善资本市场信息环境吗——基于分析师盈余预测的证据[J]. 南开管理评论,2024(9):161-172.
- [22] 张志宏,王艺颖. 纳税信用与现金持有价值[J]. 会计研究,2023(4):132-143.
- [23] 张正勇,胡言言,吉利.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能够降低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吗? [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7(5):85-95.
- [24] 后小仙,郑田丹. 金融化、财政激励与企业投资结构[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1(3):117-127.
- [25] 胡国柳,周遂. 政治关联、过度自信与非效率投资[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12(6):37-42.
- [26] 王娇,王凡林. 客户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协同治理还是嬗变失配[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4(4):81-91.
- [27] 聂辉华,阮睿,沈吉. 企业不确定性感知、投资决策和金融资产配置[J]. 世界经济,2020(6):77-98.
- [28] 闫慧慧. 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投资结构偏向:“投实”抑或“向虚”[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3(3):55-70.
- [29] Ohlson J A. Financial ratios and the probabilistic prediction of bankruptc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80,25(1):109-131.
- [30] 辛清泉,孔东民,郝颖. 公司透明度与股价波动性[J]. 金融研究,2014(10):193-206.
- [31] 褚剑,秦璇,方军雄. 中国式融资融券制度安排与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偏差[J]. 管理世界,2019(1):151-166+228.
- [32] Richardson S. 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06,11:159-189.
- [33] 李青原,罗婉. 财务报表重述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4(5):48-58.
- [34] 牛彪,王建新,于翔. 逆向混改、容错机制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J]. 经济体制改革,2023(6):108-116.
- [35] 李连军,戴经纬. 货币政策、会计稳健性与融资约束[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6(1):75-82.
- [36] 陈艳利,赵红云,戴静静. 政府干预、产权性质与企业脱困[J]. 经济学动态,2015(7):80-90.
- [37] 牛彪,王建新. 混改背景下国企超额雇员对突破性创新的影响[J]. 北京社会科学,2022(10):107-117.
- [38] 施平. 企业增长、规模与财务风险的相关性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0(6):62-67.
- [39] 傅顺,王正位,王宇桐,等.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企业现金持有? [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3(4):44-52.
- [40] 梁洁莹,刘小勇,张展培. 普惠金融稳定器与加速器效应研究——基于企业融资约束视角[J]. 统计研究,2024(6):71-85.
- [41] 焦方义,逢佳宁. 营商环境与金融集聚:基于中国省级与地市级的数据分析[J]. 求是学刊,2023(5):68-85.
- [42] 张三保,康璧成,张志学. 中国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与量化分析[J]. 经济管理,2020(4):5-19.

[责任编辑:杨志辉]

Can Flexible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Reduce the Uncertainty Perception of Enterprise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ax Credit Ratings

DU Yuqing¹, WANG Jindong¹, WANG Mengkai², YANG Jing³

(1. Chinese Academy of Fiscal Sciences, Beijing 100142,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3. School of Accounting,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ohhot 010070, China)

Abstract: Flexible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ax administr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pillover effect caused by flexible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poli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uncertainty perception. Taking the tax credit rating policy as the natural experiment, a different-difference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test the effect of the policy on the uncertainty perception of enterprises. It is found that flexible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uncertainty perception of enterprises.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the flexible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policy can reduce the uncertainty perception of enterprises by exerting “resource effect” and “information effect”. Heterogeneity test at firm level shows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lexible tax collection on firm uncertainty perception is more obvious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est shows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lexible tax collection on firm uncertainty perception is more obvious in enterprises with low fin-tech level, high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not only enrich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flexible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and the uncertainty perception of enterprises, but als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furthe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system.

Key Words: flexible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tax credit rating; uncertainty perception; reform of the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system; tax compliance; governance of tax avoidance